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OPENING DOORS Dr. Schumpeter

开门(下) ——创新理论大师熊彼特

[美]洛林·艾伦◆著
马春文等◆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OPENING DOORS Dr. Schumpeter

开门(下)

——创新理论大师熊彼特

[美] 洛林·艾伦 ◆ 著

马春文 等 ◆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门——创新理论大师熊彼特 / (美)艾伦著;马春文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11

(人文译丛)

ISBN 978-7-206-07168-3

I. ①开…

II. ①艾… ②马…

III. ①熊彼特, J.A.(1883~1950)—传记

IV. ①K837.12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6265 号

开 门——创新理论大师熊彼特(上、下)

著 者:(美)洛林·艾伦

译 者:马春文等

责任编辑:王平 门雄甲

封面设计:张迅 孙浩瀚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制 版:吉林人民出版社图文设计印务中心

印 刷: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1000mm 1/16

印 张:37.75 字数:52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7168-3

版 次:2011年1月第2版 印 次: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6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 | | |
|-----------|---------|-----|
| 前 言 | 沃尔特·罗斯托 | 001 |
| 序 | 洛林·艾伦 | 001 |

上篇 欧洲岁月

| | | |
|-----------------------------------|--|-----|
| 第一章 卓尔不群、矛盾重重的熊彼特 | | 003 |
| 第二章 家世 (1881—1901) | | 008 |
| 第三章 奠定基础 (1901—1906) | | 030 |
| 第四章 神圣十年的开端 (1903—1908) | | 048 |
| 第五章 早年的思想成果 (1908—1909) | | 068 |
| 第六章 切尔诺维茨和思想的发展 (1909—1911) | | 090 |
| 第七章 格拉茨、顿悟和美国 (1911—1914) | | 110 |
| 第八章 战争、经济学和政治 (1914—1918) | | 132 |
| 第九章 财政部长 (1918—1919) | | 154 |
| 第十章 挚爱的抚慰 (1919—1925) | | 175 |
| 第十一章 波恩与新生 (1925—1926) | | 193 |
| 第十二章 悲剧与归程 (1926—1927) | | 212 |
| 第十三章 初访哈佛 (1927—1928) | | 230 |
| 第十四章 教学与旅行 (1928—1931) | | 244 |
| 第十五章 波恩、柏林和远行 (1931—1932) | | 268 |

第十六章 哈佛校园中的巨人 (1932—1933) 292

下篇 美国岁月

第十七章 告别欧洲 (1933—1935) 309

第十八章 研究与恋爱 (1935—1936) 324

第十九章 教学与婚姻 (1936—1937) 342

第二十章 鲜为人知的生活 (1937—1938) 357

第二十一章 《经济周期》(1939) 376

第二十二章 落落寡合 (1939—1942) 392

第二十三章 资本主义的命运 (1942) 420

第二十四章 劳乏困顿 (1942—1945) 443

第二十五章 不舒服的新世界 (1945—1947) 464

第二十六章 回报、矛盾和安慰 (1947—1948) 487

第二十七章 大阅兵 (1942—1949) 509

第二十八章 与“亲人”团聚 (1948—1950) 526

跋 552

附 录 熊彼特年表 574

译后记 577

人文译丛

下 篇 美 国 岁 月



第十七章 告别欧洲

(1933—1935)

在哈佛大学的第一学年快要结束的时候，熊彼特思虑着自己的将来。是应该留在美国，还是应该返回欧洲呢？他在1937年夏天的时候已经做出了访问欧洲的决定。但是，他是愿意回到欧洲并生活在希特勒当权的德国，还是愿意留在罗斯福执政的美国呢？陶西格提醒他，当时纳粹控制着大学里的人员任命，即使熊彼特能够获得任命，也很可能无法保持职位。国家社会主义的性质正在变得明显。反犹运动已经使许多大学教职空缺，但如果犹太人不能在纳粹德国生存下去，熊彼特能吗？在美国，他至少有言论和写作的自由，而且他的人身自由和经济地位会得到保障。虽然美国仍是一个“不舒服”的国家，德国有诸多的诱人之处，但德国却令人感到害怕。

美国的民主既吸引也排斥着熊彼特，他认为美国已经过分民主了。熊彼特认为美国的政治体系对于追求自我利益的压力集团和经济集团的贪婪异乎寻常地敏感，20世纪30年代它的政治领袖正醉心于实行17和18世纪的重商主义政策，而这些政策早在19世纪就已被现代国家摒弃了。但无论如何，美国是自由的，没有人对别人的言论、思想和行为发号施令。虽然美国令人感到不舒服，但剑桥却是一个例外。在任期之初，熊彼特对哈佛大学非常满意，尤其满意它的朝气蓬勃；而且同波恩和柏林相比，剑桥是一个经济学和其他各个领域的知识中心。许多看破政治和红尘的人来这里追求知识。尽管希特勒的某些想法有一点儿吸引力，尽管自己对欧洲的一切难以忘怀，熊彼特心里清楚他是无法在纳粹统治

下生存的。1933年5月3日，熊彼特这个到美国只有7个月的人，乘出租车来到了波士顿市中心的联邦大楼，在那里他表达了成为美国公民的愿望。

1

1933年5月28日，星期日的早上，熊彼特乘坐思夏（Scythia）号汽船从波士顿前往英国。他自己说当年夏天以及接下来的两个夏天返回欧洲的目的是研究法国大教堂建筑，这是一个需要呵护的、持续终生的兴趣。有人半开玩笑地打趣说，熊彼特最伟大的著作将是关于法国建筑的。由于他想见到米娅，所以这次旅行不单单是一个假期，而且还是与老朋友重逢的机会。在这次旅行中，熊彼特没有工作（在“工作”这个词的通常意义上），但他仍做计划并且思考问题。无论在哪儿，他都会抓住机会拜访当地的经济学家，同他们交谈并寻求灵感。他向自己和其他人表明，他需要利用这段时间，撇开经济理论日有所增的要命的沉闷，以便以后在研究中更好地去面对。

旅行伊始，他在英国逗留了两天。他访问了伦敦、剑桥和牛津。在伦敦时，他常去美术馆、伦敦经济学院和大英博物馆，后者是马克思工作过的地方，在这儿他总要和以前一样坐上一会儿。在剑桥和牛津，特别是在与那些伟人、准伟人和学生共进午餐晚餐时，先生和教授们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些人中包括梅纳德·凯恩斯、聪明的年轻人卡恩（R.F. Kahn）和琼·罗宾逊，后者的新书正在吸引着经济学家。有时，他在许多同学和老师面前侃侃而谈。英格兰几乎成了他的第二个家，他喜欢在那里度过的每一分钟。1933年6月11日，他到了法国鲁昂（Rouen）；一周后去了拉罗谢尔（La Rochelle）。他接着在比亚里茨（Biarritz）待了两周，然后去了阿维尼翁（Avignon）、尼姆（Nimes）和法国其他一些地方，包括格勒诺布尔（Grenoble）和沙特尔（Chartres）——看大教堂。最后，在8月中旬，他到了巴黎。整个旅法期间，他利用晚上在旅店的时间，阅读

了琼·罗宾逊的新书《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准备写评论。

熊彼特对艺术和建筑的喜好是天主教徒式的，充满了对哥特式建筑的偏爱。他不惜时间穿梭于各个教堂之间，画窗和塔的图案。他从附近的商店买照片，在教堂的档案处了解这些建筑的历史和结构。虽然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他的水平却可与专家相比。他还买了一些有名的艺术品的照片，并在日记里写下了他对这些艺术品的印象。罗浮宫是他最钟爱的一个。无论在哪一个城市，他都走访本地的教会、大教堂和美术馆。熊彼特不是一个艺术鉴赏家，而是一个既狂热又有学识的艺术品购买者，他不但喜欢个体肖像画而且还喜欢群体油画。

8月份，熊彼特见到了米娅。她仍住在于利希，在波恩工作。在德国的温泉胜地放松了几周之后，他们于9月和10月初返回波恩。对两人来说，这是一段愉快的插曲，彼此没有承诺，因为这时两人都知道他们不可能结婚。初秋，熊彼特和米娅一家人在于利希附近住了几天，然后他又去了伦敦、牛津和剑桥——再次和经济学家们会面。10月份，他离开英国，乘坐拉科尼亚号汽船返回剑桥（美国），为新学期做好了准备。整个夏天没有任何事情促使他想要长久返回欧洲。

2

1933年秋，熊彼特的教学任务很重。他和陶西格及一位叫沃尔什（J. R. Walsh）的讲师一起教授价值与分配理论，但他的任务只是讲其中的几课。他仍在讲授经济趋势与波动和货币银行学。这一年教学中最有意思的是他在数理经济学方面的实验，这门课叫“经济学的数理方法导论”。但这门课进行得并不理想。熊彼特不是一个数学家，从未修过数学课。他关于这门课的知识都是自学的。他有着历史的、文学的乃至浪漫的世界观，但却没有数学头脑。他无法接受严格的符号逻辑，也无法把它传授给别人。

完全理解数学需要一种特殊的天赋，适当讲授数学所需要的天赋更

少有人具备，而熊彼特不具备这种天赋。数学教学埋没了熊彼特教学的许多特色部分，包括他的旁征博引、重要却常被忽略的事实、大胆的假设、有趣的悖论、精致的文字分析和意味深长的结论。系里很快决定由另外一位在数学方面受过更多训练的人（如里昂惕夫或威尔逊），来讲这门课。即使不讲这门课，熊彼特还是有收获的，因为他的目的绝对不是自己讲这门课，毕竟熊彼特敦促系里开了数理经济学这门课，并使之延续下去。并非所有人都认为熊彼特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爱德华·梅森是经济学课程的一名初级教员，他旁听了这门课，后来提到他从这门课程学到了一些东西。

1933年秋季，熊彼特已经彻底地融入了整个学院，他开始热心地去感化年轻人。他不想费更大的劲儿去感化老年人和他的同龄人。在日记中，熊彼特轻蔑地写到了三“布”——布洛克（Bullock）、布莱克（Black）和布尔邦克（Burbank）。但他认为哈佛的年轻人充满希望。毕竟对于一个学者来讲，20—30岁之间是最重要的，熊彼特感到有责任指引年轻的经济学家度过这段日子。

1932年，在那些对理论感兴趣的人中间，他组建了一个名为“古诺小组”的非正式组织，这个名字源于17世纪以其数学表达方式闻名的法国经济学家安东尼·奥古斯汀·古诺。这个组织的目标是鼓励它的成员进行经济学研究。

这个新成立的小组与“七贤”和另一个熊彼特日记中称做“内部圈子”的组织以及偶尔举行的星期五研讨班的活动交叉。所有这些都是非正式的组织，时有时无，一脉相传于20世纪20年代的“机会、爱情和逻辑协会”。活跃时，一个团体通常一个月相会一次，但有时更频繁些。星期五晚上聚会的地点通常是洛克波斯（Lochobers）、蚝屋（Oyster House）或剑桥和波士顿其他不错的餐馆。饮食过后，大家一边品着白兰地，一边聊天，然后大家返回会馆、公寓或者某个成员的寝室休息。熊彼特做东的时候，大家则常在哈佛学院俱乐部的楼上房间见面。虽然主要是讨论经济学，但并不都是严肃的。会员们鼓动熊彼特去了位于波士



顿斯考雷广场 (Scollay Square) 的“老霍华德” (Old Howard), 那里的脱衣舞表演使他很高兴。这些集会之后, 大家喝得更多, 直至谈到深夜。

虽然这些组织并非为了实现任何具体的目标, 但有时候好的结果会不请自来。比如, 《复苏计划的经济学》是“七贤”每人贡献一章的产物。1933年秋的一次聚会上, 里昂惕夫拿出了一篇题为《复合商品和指数问题》的论文。几经修改后, 此文于1936年由《经济计量学》杂志发表。但当时的真正目的还是交流思想和学习。熊彼特的动机非常明显。他沉浸于那些可爱的年轻人的智慧和洞见, 体会那种只有涌动着的年轻的心灵才有的智力上的激情。而且, 他还要唤起年轻的同事和学生们的兴致。熊彼特需要有人倾听他的冥想, 而且也需要一个把他视为良师的团体对他的尊重。团体取代了家庭生活, 这些场合融合了友谊与智慧, 使他从图书馆和陶西格的家中走了出来。除了这些团体, 熊彼特只有有限的社交生活。

哈佛1930年的熊彼特团体并不是为了建立一个学派, 即那种拥有共同的经济观, 追随着某一位伟大学者的非正式学术团体。和在波恩时一样, 熊彼特在哈佛仍旧反对学派, 他不想控制这些年轻人并把自己的经济学教给他们; 也不想灌输一种思考经济学或其他任何事情的特定方式。他的团体不追求一致性。相反, 他要让每一个人在自己擅长的方面成长起来。如果保罗·斯威齐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熊彼特就希望他成为美国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熊彼特很少提及自己的理论, 他谈论那些成员们关心的问题, 而不是让大家咀嚼他自己的想法。

但一个新的学派却不是他想追求的, 熊彼特喜欢吸引年轻人的注意。因为他年龄最大且智力上最成熟, 所有较他年轻的人都向他寻求指导、建议和想法。赛摩尔·哈里斯当时是哈佛的一位年轻讲师, 他讲述了曾经和熊彼特共进午餐的经历:

我老是害怕这些午餐, 虽然熊彼特是一位最有情趣和最开朗的同伴, 但和熊彼特一起午餐是使人精疲力竭的经历。关于某个

领域，他很快就会比谈话人所知道的还多，他马上开始穷追不舍，提出建议并严密地讨论每一要点。每次这样的午餐后，整个下午我都会不知所措，但收获是巨大的；而可以肯定的是，熊彼特要么返回了教室上课，要么去会见学生，迎接那费力的几个小时的答疑时间。

他尽力去了解并帮助研究生，他在霍尔约克 42 号的办公室成了许多有能力的年轻人的引力中心。丹斯特会馆的日程表上，规则地排满了那些乐于谈论经济学的学生们。每次在校园和广场路过，他都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好奇的人们。他好像总有半小时的闲聊时间，或者在自己的办公室，或者在默尔（Merle's）——马萨诸塞大街上对着魏德纳图书馆后门的那家咖啡馆。和许多教授不同，熊彼特甚至和傻瓜、自大者谈话，因为他相信即使他们有时也会有思想。

3

熊彼特和硕士生、年轻讲师及助教们有着特殊的亲密关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不能和一些同龄人和睦相处。他在正教授和副教授当中口碑良好，但和他们大多数人的关系并不密切。对他们来讲，熊彼特是一个古怪的奥地利绅士——可能是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虽不惹人生厌，却不算一个大经济学家。他们尊重他和他的思想，但不和他做朋友，也不想让他成为领袖。他和陶西格等成名学者相处甚好，还经常与经济史学家艾伯特·佩森·鄂舍一起午餐。另一位史学家阿瑟·H·科尔（Arthur H.Cole）——后来进了商学院，开始对熊彼特理论中的企业家的历史产生了兴趣。熊彼特也和威廉·列奥纳德·克拉姆相处很好，二人最终合著了一本书。里昂惕夫已经是一个世界级的经济学家，却还是一名低级教员；这和后来进入哈佛的戈特弗莱德·哈伯勒有些相似。除了这些同事，熊彼特和系里的许多正教授之间没有交往，即使有也只是表面上

的。在经济学系之外，熊彼特的交往有限，只结识过几个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却未建立起长久关系。但塔尔科特·帕森斯是例外，因为他在去社会学系之前曾学习经济学。

这部分是因为他对大多数同事尤其是经济系之外同事的漠不关心，熊彼特在校内影响不大。他不喜欢大学这样的机构和组织。虽然这些机构和组织对他的研究而言是有用的，但从他个人的角度讲，他认为不值得为此投入时间和精力。他不参加例行的教职员大会，不在大学委员会任职，不参与大学的行政和管理。他相信这套制度是用来为教授服务的，而不是相反。因此他觉得只有那些没有科研才能的人才应当为这个机构服务。他认为对系里和正教授会议关注是应该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决定了经济学的全部课程和人员。

熊彼特对本科生不感兴趣，除非是特别有才能的学生。他关于大学作用的观点没有为本科生教育留有空间，因此他从未完全理解哈佛为什么突出本科生教育。在他理想的大学概念中，不存在“学生”，只有作为师傅的学者和作为徒弟的学者，他们在一种类似于中世纪的安排下一起工作。师傅和学徒教学相长，共同推进知识进步。他的大学里也没有那些只是为取悦父母和遵从家族传统上学的人。没有照顾处于青春期和成熟期之间的学生的保姆和避风港，大学只是为那些聪颖、专注的科学和思想工作者服务的。

为了共同学习和接近学生，他采用了在格拉茨和波恩曾用过的办法：答疑。熊彼特继续保持规则的办公时间，但是熊彼特和那些教授不一样，他们并不费神使学生感到自己受欢迎，熊彼特则主动鼓励学生们过来交谈。在课堂上，他给学生们每人发一张纸条，以便写下午后答疑的预约时间。几乎哈佛经济系的所有研究生都同熊彼特建立起了个人联系。许多学生都很敬畏他。由于他那浓重的奥地利口音和他的贵族个性，大多数学生都感觉他很特别，但是他对同学们显而易见的关心吸引了他们。

他的与众不同吸引了许多学生，却阻碍了与一些同事的来往。熊彼特在口试中的一些做法招致了别人的反感。比如，他有时会打断学生的

回答，向发问的教授质疑，问他究竟是什么意思并会继续发难。激怒同事似乎使熊彼特非常高兴，只是为了高兴。教授统计学的埃德温·弗里基拒绝和熊彼特一起进行考试，因为他不想面对这样的质问。其他人则很不情愿地敷衍他。然而，熊彼特与那些他喜欢且尊重的同事相处甚好，并受到他们的欢迎。他常和里昂惕夫、梅森、索罗金、鄂舍、卡尔·斯纳德（Carl Snyder）、罗伯特·布莱克、科伦·布林顿（Crone Brinton）（后两位属于历史系）等共进晚餐。1934年3月，他去了赛摩尔·哈里斯夏天在新罕布什尔的伊斯特林奇（East Rindge）的住处，和哈里斯一家一起度过了一个周末。除了一些社交邀请，这个学年熊彼特几乎过着一种彻底的学术生活，用大部分时间来研究、讨论和写作经济论文。在剑桥，他大部分时间是单身度过的，因为哈佛的女研究生和讲师很少，而且她们中的大部分对于五十岁的熊彼特来讲，又太年轻。在拉德克里夫的女研究生和教员中间，熊彼特也偶尔找一位女伴；但这样的社交出游没有冲击一个知识分子的单调生活，他致力于自己的工作和学生的发展。

4

1934年夏，他的正常生活再一次中止。熊彼特第二次出游欧洲，去研究法国的大教堂。7月10日，船行英国，他直接去了伦敦经济学院——他在英国永远的第一站。巧的是，当时正是经济学教授和研究生按每年惯例远足出行的日子。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后来回忆起了这次出行：

30年代中期的一次河上野餐，我最后一次见到熊彼特。学院（伦敦经济学院）研讨班每年一次的出游之日，他出人意料地从美国来到这里。他马上请求以名誉成员的身份参加这次远足。7月，天气晴朗，在特威克纳姆（Twickenham）和达切特（Datchet）之间，我们沿泰晤士河顺流而下。我看见熊彼特兴高

采烈地坐在船首，身边围着一群饥渴的心灵——尼基·卡尔多（Nicky Kaldor 现在的爵士——作者注）、阿巴·勒纳（Abba Lerner）、维克多·埃德尔伯格（Victor Edelberg）、乌苏拉·希克斯·韦伯（Ursula Hicks-Webb）——他是这次远足的主要组织者，他两个手的手指相互按着，温文有礼地做着演讲，闪现着理论和人格方面的智慧。

在此之后，熊彼特拜访了伦敦、剑桥和牛津的其他朋友，并游览了温切斯特（Winchester）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和威灵顿山（Willington Hill）。

几天后，熊彼特渡过英吉利海峡，在比利时奥斯坦德（Ostende）待了几日，然后去了波瓦（Beauvois）、巴黎、尼斯（Nice）和法国的其他城市。旅行初期，米娅与熊彼特会面，驾驶租来的车和熊彼特一起在法国乡间旅行。然后，米娅返回波恩；熊彼特留在法国，后来去了意大利。7月末，他去波恩接米娅，二人一起在德国的温泉胜地度过了8月的大部分时间。他们游泳、打网球、出游，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但是，熊彼特的这次旅行却并非全部在度假。他以前在波恩的一个学生赫伯特·扎森浩斯在温泉胜地拜访了他们；秉烛夜谈时，熊彼特倾诉了自己研究中遇到的麻烦。

1934年春，他在写货币理论的同时写作《经济周期》，遇到了许多困难。在写作该书时，他拼命地想用数学方式来表述和分析他的发展理论，包括经济周期理论，并用正式模型从统计上检验该理论；不幸的是，他失败了。经过和扎森浩斯的讨论及认真思考之后，他决定改写研究计划，把暂时难于处理的货币理论著作放在一边，全力以赴写作《经济周期》。在日记中，他记下了他的计划——1935年中期完成《经济周期》；然后继续写作货币理论著作，并希望在1936年完成。这个工作安排使他得以在1936年中期主要进行经济理论研究。大萧条给工业化国家带来的痛苦部分地促成了这一决定。他也不想回到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这个理论构成

了他关于经济周期的看法的基石。但是他的货币理论著作的失败也是原因之一。做出决定后，熊彼特返回哈佛开始了又一个繁忙的学年。

5

1934 年秋，熊彼特又开始讲授经济学的数学方法，但这是他最后一次尝试讲这门课，第二年里昂惕夫接下了这门课。另外，熊彼特还讲授高级经济理论课程和经济周期课程。三门课程要比一般哈佛教授的任务都重，但是，在熊彼特整个职业生涯中，他通常每学期授三门课。作为经济理论的主讲教师，熊彼特在 20 世纪 30 年代哈佛几乎所有博士生的教育中，都起着重要作用；而且他经常主持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但熊彼特仅仅指导了少量的博士论文；学生们认为，经济理论领域的题目要求为知识做出原创性贡献，而这是最困难的，所以很少有人写这一方面的论文。1934—1935 年，一位叫阿瑟·斯密西斯的学生选择了生产理论，还有其他几位，特别是选择经济周期和货币的学生，选择了熊彼特作为成员的指导小组，并向他请教。

教学虽然很费时间和精力，却还不至于减少熊彼特的谈话和答疑时间。1934 年年底以前，他至少和八个团体进行了对话，在春季至少同六个团体进行了对话；这里面包括一系列的讲演，这些都列在他的日记中。熊彼特把做演讲看成他的工作中重要且富于乐趣的一部分。他独立地准备每一个演讲，他不做现成的和常规的讲演。一如既往，他讲演时不用讲稿，虽然他在讲演之前已经很详细地做了准备和研究。这些备而不用讲稿的开头一般都有“安妮”（Annie）或“安娜”（Annerl）字样。他讲演的主题涵盖广泛，从狭隘的技术性问题到超越经济学范畴的一般题目无所不包。他那娴熟的讲演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形象——一个对自己的广博知识充满信心、对自己的思想确信无疑的人；但他的讲义表明他始终在依靠他的“亲人”。

1934—1935 学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雷德沃斯·奥佩的《经济发